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李练军

（江西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 基于江西省 1056 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运用有序 Probit 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随迁子女受教育、稳定就业、农村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 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政策影响最大，进城落户政策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政府工作成员次之，性别影响较小。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结构性变量；个体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6)03－0047－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对农民工问题日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国内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变化及实施效果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发展阶段方面。现有研究分别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2]、四个阶段[3－4]和五个阶段[5－6]，从其发展变化趋势来看，这三种划分方法并无本质区别。本文认为将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划分为从限制到松绑阶段（1978－1988）、从控制到规范阶段（1989－1999）、从就业引导到全面服务阶段（2000 至今）等三个阶段，更能充分体现各阶段内部演变特征及时间上的承接性。二是政策内容变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经历了从紧到松、从严到宽、从无序到规范的过程[6]，从关注农民工生存向关注农民工发展进行转变[7]。进入 21 世纪以后，国家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作出了较大调整，政策目标从单一的就业向安居、就业、城市融入、公共服务等综合目标转变[4]，政策职能由对农民工的防范管理开始向以人为本、公平对待的服务职能转变[8]。在国家颁布的最新文件中，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已经涵盖了就业创业、劳动保障权益、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城镇落户及社会融合等各个方面。三是政策实施效果方面。虽然现有的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化进程，但依然存在政策规定与实践效果断裂错位现象，一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以下数据反映了近年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户籍政策来看，2013 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 53.7%，而户籍城镇化率仅为 35.7%；2009 年江苏 2 万多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中只有 6 人顺利落户[9]。从就业政策来看，2009 年经历失业、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和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分别达到 57.0%、54.3% 和 76.4%[10]。从随迁子女受教育政策来看，虽

收稿日期： 2016－02－03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6.03.0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2YJC790095）

作者简介： 李练军（1974—），男，江西高安人，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与管理。E-mail：lilianjun3813@sina.com

然2011年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办公学校比例达80%,但中西部地区如贵州省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办公学校比例却只有53.9%,且就读公立重点中小学的比例均在15%以下[11]。从住房政策来看,2012年重庆市新生代农民工租房居住的比例达32.9%,自购住房比例仅占8.5%;61.7%的新生代农民工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0平方米,而4人及以上混合居住的比例高达47.3%[12]。从社保政策来看,2012年我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参与率分别为14.3%、16.9%、8.4%、6.1%,2013年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只有27%,均远低于城镇居民参保比例[8]78。

综上,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农民工对现有的市民化政策是否满意,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厘清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执行效率。国内学者对农民工工作满意度[13-14]、生活满意度[15]、就业满意度[16]、培训满意度[17]及信息满意度[18]等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对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研究相对较少,鲜有学者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本文以江西省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国家有效实施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论证依据。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时间为2013年12月到2014年3月,调查区间包括全省11个地级市,以及随机抽取的29个县市区。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等方面。调查对象为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岁以上,在其务工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本次调查共填写1200份问卷,剔除了不合格样本,实际有效问卷为1056份,有效率达到88%。

根据样本统计调查显示,男性和已婚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到58.5%和52.7%,42.4%的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初中和高中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83.2%;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平均劳动力人数为2.87人,家庭平均年收入大多在4万元以下(占79.6%),家庭中有成员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较少(占21.4%),有随迁子女的家庭也不多(占32.6%)。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从总体满意度、结构性满意度和个体异质性满意度三个层面来综合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水平。

1. 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评价

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并采用逆向赋值,将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感觉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5、4、3、2和1。理论中值得分为3,分值大于3则为不满意状态,分值小于3则为满意状态。经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及其分布比例进行测量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均值为2.43分,小于理论中值,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总体市民化政策比较满意;从分布比例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感觉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分别为6.5%、21.9%、28.6%、33.8%和11.2%,比较满意的比例最高,而很不满意的比例最低。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条件得到一定程度改善,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其对市民化政策较为满意,感觉很不满意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少。

2. 市民化政策结构性满意度评价

目前国家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涵盖面非常广泛,借鉴有关学者的研究并考虑政策的重要性,主要从进城落户、稳定就业、随迁子女受教育、房屋租住、社会保障、农村土地退出等6个方面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结构性满意度,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满意度

评价的 6 个结构变量中,社会保障得分最高,为 2.79 分;其次是房屋租住和进城落户,分别为 2.74 分和 2.66 分;再次是土地退出和稳定就业,分别为 2.51 分和 2.35 分;最低是子女教育,为 2.18 分。从分布比例来看,感觉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最高的是子女教育(分别为 13.8%、35.6%)和稳定就业(分别为 14.4%、32.3%),感觉一般比例最高的为土地退出(30.8%),感觉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比例最高的均是房屋租住(分别为 27.6%、8.5%)和社会保障(分别为 26.8%、9.7%)。无论是均值得分还是比例分布都表明,在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构成要素中,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政策最不满意,其次是房屋租住政策和进城落户政策,再次是农村土地退出政策和稳定就业政策,最满意的是随迁子女受教育政策。

表 1　市民化政策结构性满意度评价及分布比例

结构变量	均值分析		分布比例(%)				
	均值	标准差	很不满意	不太满意	感觉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进城落户	2.66	0.63	7.8	26.2	27.9	28.7	9.4
稳定就业	2.35	0.75	5.1	21.5	26.7	32.3	14.4
子女教育	2.18	0.74	5.5	19.8	25.3	35.6	13.8
房屋租住	2.74	0.69	8.5	27.6	28.5	27.1	8.3
社会保障	2.79	0.78	9.7	26.8	28.4	27.4	7.7
土地退出	2.51	0.82	4.8	23.5	30.8	29.6	11.3

3. 市民化政策个体异质性满意度评价

为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差异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从农民工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三方面个体特征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个体异质性满意度。市民化政策个体异质性满意度评价如表 2 所示。

表 2　市民化政策个体异质性满意度评价

个体特征		总体	进城落户	稳定就业	子女教育	房屋租住	社会保障	土地退出
性别	男性	2.35	2.59	2.14	2.38	2.63	2.44	2.37
	女性	2.51	2.16	2.86	2.45	2.27	2.47	2.40
年龄	16~24 岁	2.14	2.10	2.48	2.12	2.56	2.20	2.05
	25~30 岁	2.26	2.35	2.36	2.28	2.41	2.39	2.28
	31~35 岁	2.53	2.47	2.27	2.34	2.35	2.38	2.52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48	2.44	2.67	2.38	2.56	2.58	2.31
	初中	2.46	2.40	2.43	2.42	2.44	2.47	2.36
	高中及中专	2.34	2.36	2.21	2.45	2.37	2.36	2.38
	大专及以上	2.21	2.32	2.08	2.51	2.22	2.15	2.43

从表 2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个体异质性满意度评分均存在差异。从性别来看,男性农民工得分明显低于女性,说明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上更为满意;但在进城落户和房屋租住方面,女性得分要低于男性,女性对这两项政策更为满意。从年龄来看,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不断增长,满意度得分呈较快上升趋势,说明农民工年龄越大其市民化政策满意度越低;但在稳定就业和房屋租住方面,得分呈不断下降趋势,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农民工对稳定就业和房屋租住政策满意度不断提高。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满意度得分呈较快下降趋势,说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市民化政策满意度越高;但在子女教育和土地退出方面,得分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工对随迁子女受教育和农村土地退出政策满意度不断下降。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本文所考察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其含义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满意程度。根据调查问卷，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依次是很不满意、不太满意、感觉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5、4、3、2和1，代表满意度是有序降低。由于反映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数据是离散型数据，所以通过构建有序Prob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表示为：

$$\text{Pro}bit(Y_i) = \beta_0 + \sum_{K=1}^{K}\beta_K X_{iK} + \sum_{U=1}^{U}\alpha_U personality_{iU} + \sum_{V=1}^{V}\alpha_V family_{iV} + \mu_i$$

式中，被解释变量 Y_i 表示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总体满意度，其中，i 表示第 i 个样本。解释变量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本文设定为结构性自变量和控制性自变量两类。结构性自变量（X_{iK}）是指农民工进城落户、稳定就业、随迁子女受教育、房屋租住、社会保障和农村土地退出政策满意度等6个方面，主要考察农民工对这6个方面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控制变量主要是指个体特征变量（$personality_{iu}$）和家庭特征变量（$family_{iV}$），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和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是否有成员在政府部门工作、子女是否随迁和家庭年收入等。K、U 和 V 分别为结构性自变量、个体特征自变量和家庭特征自变量的个数；β_K、α_U 和 α_V 是待估计参数，分别为结构性自变量、个体特征自变量和家庭特征自变量的系数；μ_i 表示残差项，假设 μ_i 对自变量的条件分布为标准正态分布。所有变量的定义、赋值及预期方向见表3。

表3 变量定义、赋值及预期方向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预期方向
结构性变量		
进城落户政策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
稳定就业政策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
子女教育政策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
房屋租住政策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
社会保障政策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
土地退出政策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
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	16～24=1；25～30=2；31～34=3	+
性别	女=0；男=1	−
婚姻	未婚=0；已婚=1	+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及中专=2；大专及以上=3	−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劳动力人数	3人及以下=1；4人=2；5人=3；6人及以上=4	+
政府工作成员	无=0；有=1	−
子女是否随迁	否=0；是=1	+
家庭年收入因变量	2万及以下=1；2～4万=2；4～6万=3；6万以上=4	−
因变量		
政策总体满意度	非常满意=1；比较满意=2；感觉一般=3；不太满意=4；很不满意=5	

（二）实证结果分析

首先，将所有变量全部引入计量经济模型，并对其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从而得到模型1；然

后,采用向后筛选法,按照 a = 0.1 的标准水平逐渐剔除不显著变量,直到全部变量都在 10% 及以下水平上统计显著,最终得到模型 2,有序 Probit 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两个模型都通过检验且揭示的内涵基本一致,但在模型 2 中,进城落户政策、土地退出政策及政府工作成员等 3 个变量的显著性要优于模型 1,因此本文下面的讨论以模型 2 为主。模型 2 参数估计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为 -308.297,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比较好。

表 4　有序 Probit 模型检验结果

模型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Z 值	P 值	系数	Z 值	P 值
结构变量	进城落户政策	0.321	2.432	0.015	0.352	2.484	0.009
	稳定就业政策	0.579	3.481	0.000	0.607	2.612	0.000
	子女教育政策	0.492	2.748	0.006	0.516	3.615	0.003
	房屋租住政策	0.654	3.090	0.002	0.663	2.968	0.000
	社会保障政策	0.187	2.612	0.009	0.215	3.390	0.005
	土地退出政策	0.260	2.484	0.013	0.272	2.807	0.006
个体特征	年龄	-0.553	2.024	0.043	-0.584	2.075	0.038
	性别	-0.164	1.799	0.072	-0.193	1.717	0.086
	婚姻	0.250	0.713	0.476	–	–	–
	受教育程度	-0.492	2.807	0.005	-0.521	2.878	0.004
家庭特征	家庭劳动力人数	0.357	1.969	0.049	0.365	1.986	0.047
	政府工作成员	-0.027	1.873	0.061	-0.058	2.108	0.035
	子女是否随迁	0.054	0.902	0.367	–	–	–
	家庭年收入	-0.189	2.652	0.008	-0.203	2.612	0.009
对数似然比 Log Likelihood			-296.316			-308.297	
伪判决系数 Pseudo R2			0.2652			0.2273	

1. 所有结构性变量均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进入有序 Probit 模型的 6 个核心变量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所有结构性变量都是新生代农民工市化政策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显著性最强的是稳定就业和房屋租住,其次是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最后是土地退出和进城落户。由此可见,稳定就业政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其最关心的市民化政策。没有稳定的就业,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就失去了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农民工市民化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米之炊。房屋租住政策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很重要的因素,居有所安是农民工市民化要解决的第二大问题。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且影响较大。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农民工更多地关心下一代的教育与成长,而近些年来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满意度产生了较大影响。社会保障是弥补户籍制度导致的权利缺失的重要途径之一,合理的社会保障政策能增强市民化意愿,但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过多承担,削弱了其政策满意度。相对来说,土地退出和进城落户政策虽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有重要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小。土地退出政策之所以影响相对较小,可能是因为现阶段土地退出机制不完善,土地征用和土地流转所带来的收入比例较小,对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影响不大。进城落户政策之所以影响较小,可能是因为户籍制度与其附属制度已经逐渐被剥离,削弱了农民工对其政策利益的预期。

2. 除婚姻外其他个体特征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在 4 个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中,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 3 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检验,说明大多数个体特征均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等 2 个变量都在 5%

及以下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产生了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性别在10%的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影响较小,而婚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年龄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与预期相反,而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则验证了前文的预期。一般来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其物质资本获取能力和就业能力就越强,越容易跨越市民化的最低门槛,也降低了其心理迁移成本,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越高;相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男性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机会更多,工作时间相对更长,适应力也更强,能够获得更高工资收入,而且其社会交往相对更为广泛,也较少受到来自婚姻、家庭与生育因素的干扰,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更高。年龄之所以与预期相反,可能是因为年龄越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越长,其收入越高,而且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配偶及子女同住城市,已经形成了相对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工作和生活比较稳定,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也就越高。婚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因为虽然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生活更加稳定,对市民化政策需求更强,但由于其本身比较年轻,育有子女且积蓄不多,即使夫妻双方都同为农民工,依然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因而市民化意愿较低使其对政策需求不强,因此是否已婚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

3. 除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家庭特征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

在反映家庭特征的4个变量中有3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家庭收入、政府工作成员和家庭劳动力人数均通过了5%及以下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大,也验证了前文的预期,而子女是否随迁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一般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劳动闲置的可能性越大,生活成本也越高,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就越大,对市化政策需求越迫切,其满意度往往越低;家庭中有成员在政府部门工作,不但会给农民工带来相关制度政策等方面的信息,而且会在农民工了解制度政策及享受制度政策的帮助支持中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市民化政策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对市民化政策越满意;家庭收入越高,越有能力满足孩子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从家庭中获得的市民化资金支持越多,市民化能力越强,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越高。子女是否随迁没有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可能是因为子女是否随迁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民化成本和随迁子女受教育政策方面,虽然子女随迁会产生更多生活和教育成本,增加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降低其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但是调查也显示农民工对随迁子女受教育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因此综合来看,子女是否随迁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运用江西省1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总体满意度较高,满意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子女教育、稳定就业、土地退出、进城落户、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6个结构性核心变量对农民工市化政策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稳定就业和房屋租住影响最大,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次之,土地退出和进城落户影响最小;除婚姻和子女是否随迁外,其他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均对市民化政策满意度产生了显著影响。

从上述实证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土地退出和进城落户政策虽然满意度不高,但其影响较小,因此不是当前市民化政策的重点;稳定就业和子女教育政策虽然影响较大,但其满意度最高,因此当前主要是继续完善相关政策;而房屋租住和社会保障政策影响较大却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不满意的政策,是当前市民化政策的重点。为此,一方面要加快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农民工城镇住房政策,适当向新生代农民工实行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分配倾斜政策,降低其住房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要完善和落实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形成合理的成本分摊

机制,以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承担成本。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兼顾其他市民化政策,继续完善农民工城镇就业与随迁子女受教育政策,有效推动城乡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参考文献:

[1]孙自法. 胡鞍钢:中国存"四农"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核心[EB/OL]. (2005 - 03 - 02)[2016 - 02 - 03]. http://www. chinanews. com/news/2005/2005 - 03 - 02/26/545225. shtml.
[2]王竹林,吕俊涛.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演进的实质和路径选择[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4): 5 - 11.
[3]刘小年. 农民工政策的阶段新论[J]. 探索与争鸣,2006(3):10 - 12.
[4]李中建. 中国农民工政策变迁:脉络、挑战与展望[J]. 经济学家,2011(12):70 - 76.
[5]宋洪远,黄华波,刘光明.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问题分析. 管理世界,2002(5):55 - 65.
[6]盛昕.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农民工政策的演进及发展[J]. 学术交流,2008(4):21 - 24.
[7]阳芬.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政策演变特点分析[J]. 江海纵横,2009(3):29 - 31.
[8]胡献忠. 21 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政策供给与现实路径[J]. 青年探索,2015(1):75 - 80.
[9]黄江泉,李晓敏. 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现实困境及政策选择[J]. 经济学家,2014(5):87 - 96.
[10]纪韶.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民工就业政策社会效应评估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10):89 - 95.
[11]肖庆华. 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的演变、困境和趋势[J]. 学术论坛,2013(12):202 - 205.
[12]田红艳,宋星,李世龙.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政策回应研究 [J]. 西北人口,2014(3):79 - 89.
[13]孙永正.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6(1):42 - 48.
[14]陈珍珍,吴亮. 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J]. 生产力研究,2010(5):55 - 58.
[15]黄莼,刘伟平. 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评价实证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183 - 186.
[16]程名望,史清华,顾梦蛟. 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模型与实证[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3(5):35 - 44.
[17]伍旭中,李亦含.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满意度及回报率的实证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4(4):401 - 408.
[18]陶建杰. 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2013(8):24 - 30.

A Study on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olicy

LI Lian-ju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e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of 1056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Jiangxi Province,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oli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olicy is higher;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from high to low is: children's education, stable employment, rural land exiting, settling into the city, housing rental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six structural core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olicy; stable employment policy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while the settling policy has the smallest influence. In addition to the migrant workers' marriage and children, other individu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public policy. Education level and family income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 ag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force and member of government workers has the following significant impact; gender has the low significant impact.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citizenization policy; degree of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variables;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